

透视周秦基层社会构架的一缕旭光

——初读《宝鸡旭光墓地》

张天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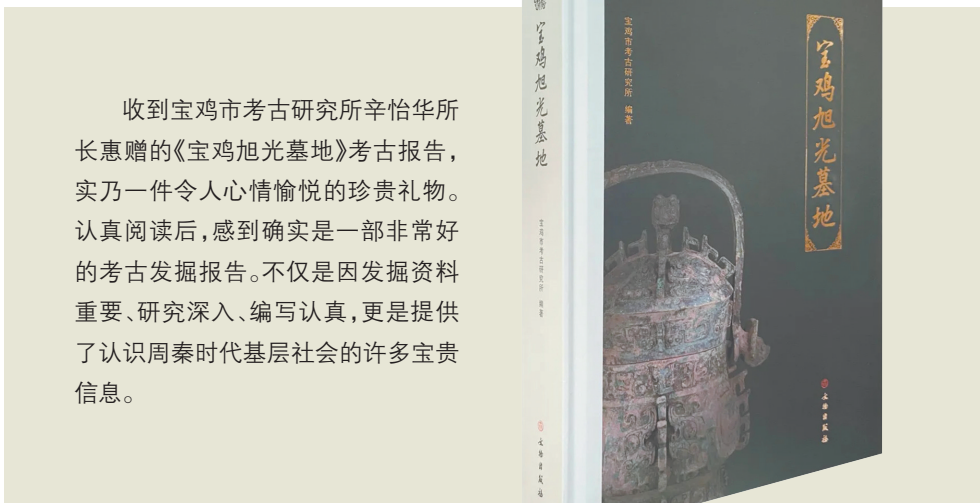
《宝鸡旭光墓地》发掘报告编印精良，正文329页、图版167版，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宝鸡市渭滨区旭光墓地发掘的47座西周(含个别西周晚期)墓和28座秦墓资料。墓地最初发现可追溯到1984年一座西周墓的抢救清理，2018年11月到2020年3月再次连续抢救发掘，出土了青铜器、金器、玉石器、陶器、原始瓷器520多件组文物。

宝鸡本为周秦王朝龙兴之地，故都胜迹犹存，两个时代墓葬的发现已属司空见惯，各种类型的墓地亦屡被发掘。市区及附近的墓地就有不少，西周的如戴家湾、石鼓山、茹家庄、竹园沟、陈仓贾家崖、凤翔西村等墓地，东周秦如宝鸡谭家村、西高泉、凤翔八旗屯、高庄等墓地及南指挥秦公陵园。相比较而言，旭光墓地的发现似稍逊色，既没有石鼓山、茹家庄、秦公墓等大型墓发现的耀眼，也不及西村、贾家崖、八旗屯等中小型墓的数量规模，但其自身具有的独特价值却不容忽视。

墓地现存范围的中小型墓葬全都经过清理发掘，报告尽量做了认真观察研究，认识到周、秦墓葬的分布，实际都存在比较清晰的分区。不同墓区的墓葬都有年代的差异，以及身份等级的区分。西周中型墓普遍有鼎、簋、鬲、觶等青铜器礼器1~3件随葬，中型秦墓则会出土青铜剑、削刀、饰件等，与同时期的小型墓均有不同。

墓地未见中型墓以上的更大墓葬，可见中型墓代表了墓地及其所属聚落的等级，应处于西周社会比较偏低的层次。在其西仅5公里的石鼓山墓地，大、中、小型墓葬均有发现，与之显然不同，墓地等级高下不言而喻。那么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，难道不值得去进一步思忖吗？早年我曾依据当时能观察到的西周大小聚落的分布特点，参考金文资料和文献线索，提出王畿地区高等级贵族采邑存在分级的现象。认为其中既有都邑性的大型中心采邑(聚落)，也有隶属于它的次一级采邑，也还有一般平民生活的普通居址。请想想，相距只有5公里的旭光和石鼓山遗址，怎么可能排除这样的关系存在？若果真如此，旭光墓地就提供了认识西周周区域社会构架的一个极典型实例。

报告揭示的另一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，就是在发掘的47座周墓中，随葬有青铜兵器的墓葬达15座，约占墓葬数的三分之一，并发现有一女性墓葬也出土青铜戈1件。这在以往的



收到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辛怡华所长惠赠的《宝鸡旭光墓地》考古报告，实乃一件令人心情愉悦的珍贵礼物。认真阅读后，感到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的考古发掘报告。不仅是因发掘资料重要、研究深入、编写认真，更是提供了认识周秦时代基层社会的许多宝贵信息。

周墓发掘中都是极其少见的。类似的还有长安少陵塬、扶风北吕周人墓地，都明显带有军事性质指向的特征，或如报告所说是负责当地“治安的武装力量”。

有意思的是，随葬兵器的墓葬在不同墓区并不是均衡分布，而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。最多的Ⅲ区，13座墓葬之中随葬兵器者达7座，已超过墓葬数50%的比例。而墓地随葬兵器的唯一女性墓，恰好也在此墓区。如报告研究所说各墓区埋葬者属于同一家族不错，那么该家族在聚落和区域范围内应充任专司军事武装之职能。就此点而言，这一发现也大有益于对西周基层社会的了解，好像在其他墓地还没有类似的发现。

此外，周墓分区显示出的血缘家族关系、墓葬方向差别、出土陶器形制、风格之差异，以及复杂的青铜器铭文等，均对深入观察西周周基层社会的人群构成、结构特征有重要意义。

墓地的东周秦墓只有27座，主体年代为战国晚期或略向前后的延伸，但也可分为南北两区，相信亦与不同的家族相关。南区墓葬很少，随葬品的种类、形制相似看不出等级的差别。北区墓葬较多，部分形制略大的墓葬或有青铜剑、饰件等随葬品，当是身份高低的体现，应属家族内较有地位的人。这同样提供了认识战国晚期秦国基层社会的可贵信息。

位于墓地南部中间略偏西的石椁墓M19，为一具有典型戎狄文化特色的春秋墓。墓葬的

形制、出土随葬品等，与墓地乃至关中地区周秦墓均有明显不同，属于面貌独特的另类文化遗存。石椁葬俗及部分马器、金饰等随葬品，显示了其与两周之际北方草原文化的联系，但表现出更多的自身特殊性。此墓的发现，是关中地区典型戎狄墓的首次亮相，揭示了春秋时段当地的人群和考古学文化之复杂性，其研究的空间甚大。

另外，报告附录的“人骨鉴定研究”“青铜器材料科技分析”“玻璃珠珠分析”等，关注了多学科合作研究，对发掘资料的深入认识有特别的意义。

当然，报告也还有某些不足。如：报告尽管对墓地的介绍详尽认真，但没有对与之相关的旭光东(东沙河东岸)遗址有任何提及，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总体而言，旭光墓地发掘收获颇丰，报告对考古资料做了很好的介绍，提供了研究周秦时期区域社会的一把钥匙，且是透射出观察周代基层社会的一缕亮光。同时，报告展现出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团队的茁壮成长，后浪奔涌，实力强劲。

(作者单位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)

《宝鸡旭光墓地》

编著：宝鸡市考古研究所

出版社：文物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3年12月

出土文物摄影小技巧

——以吐鲁番出土文物为例

周芳

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，曾经是西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之一，现已发现文化遗址200余处，出土各时期各种类别文物4万多件。对这些文物进行拍摄、存档、利用是吐鲁番学研究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。

吐鲁番出土的文物大致包括玉器、玛瑙、青铜器、陶器、泥塑、文书等。因文物的质地不同、形状不同，拍摄时使用的器材、拍摄方法和光线运用也大相径庭。现就不同类别文物的拍摄技巧进行分类探讨。

珠宝类

珠宝类文物常见的有玉器、玛瑙等，这类文物以其优美的造型、绚丽的色彩而引人注目。要把此类文物玲珑剔透、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表现出来，背景的选择、灯光的运用、曝光的控制是拍摄的关键。在拍摄时要注意顶灯光线的控制，尽量使背景与器物分离，增加立体感，表达空间深度与环境氛围，用从器物后面来的光线，勾勒出器物的轮廓线条，表现出晶莹剔透的质感。可以用一只主灯从器物的侧面打光，表现器物细如毫发的阴刻线纹路和精湛的浅浮雕；用辅灯在较远的地方对正面给以较弱的辅光，照亮整个器物，表现器物整体效果。拍摄时，珠宝类文物的摆放也十分讲究，器物上往往有镂空纹饰，如果平放会缺乏立体感。为让器物立起来，尽可能选用微小、坚固的东西作为支撑，避免在照片上留下明显的支撑痕迹。对一些较大的器物，可准备一块白色橡皮泥，按照支撑点的大小粘在器物后面，以扩大支撑面。在背景选择上，色彩不宜艳丽，可选用灰色或灰变黑渐变背景等。因为这类文物大都容易表面反光，背景反射出来的色光折射到器物表面会使色彩混乱、失真。

青铜器、瓷器、陶器、陶俑

拍摄这类器物要注意表现它们的形状、质感和立体感。突出立体感的重点在于布光，恰当地运用顶光可以勾勒出文物的器形，要注意主光与辅光的光比，避免形成大平光从而影响器物立体感的塑造。选择拍摄角度时，要找出一个能概括器物特征的最佳观赏面，还要尽力表现它的造型美。大量诸如鼎、罍、杯、尊的器物，口是这类器物的重要外形特征。拍摄时，要选择适当的角度与高度，准确地将口形表现出来。角度的高低，一般以看清口形的前后沿为宜。在背景选择上，发掘出土的陶器，有许多是用石膏修复过的，而且没



有染色，因此不能选用白色背景或白变灰黑的渐变背景。红陶和彩陶不宜选用与其颜色接近的背景，黑陶和深灰色陶器不宜选用深灰或黑色背景。总之不能靠色，选择浅灰色背景比较相宜。如要使照片中的形象具有空间感，就要选择恰当的拍摄角度。例如拍摄陶碗时，使相机所处位置正好让碗的口部在取景器中呈现椭圆形，使观看者很自然地产生空间感。拍摄中，如果器物本身具有方向性，要考虑整个画面的布局。例如陶马的拍摄，要让马头前方的空间略大于后方的空间，给予文物一种生命感、动感。

文书类

文书的拍摄要注意透视问题，保证文书不歪斜。在拍摄时，一定要保证相机镜头与文书保持水平。由于照明灯产生的高温对年代久远的文书会造成一定损伤，因此拍摄时要合理选择照明灯具，使用柔光罩、反光伞，避免灯光直接照射。保存多年的文书发黄、变旧，如果加上黄色或橙色滤光镜，适当增加曝光时间，拍出的照片会比原物清晰度更高、更整洁。拍摄文书是在室内进行的，拍摄时必须将室内的窗帘拉严，从而保证文书色彩的还原。对于光源的选择，一般采用四支散光灯，灯具的位置距离画面3米左右为宜，防止出现中间亮，两头暗的不均匀效果。同时，拍照时间不宜太长，以免灯光照射损伤文物。

文书的拍摄一般采用俯拍。俯拍是指照相机的拍摄位置高于被摄体的高度，也即照相机从上向下拍摄。这样能产生较好的空间感，尽可能全面地表现出出土文物的全貌及一些具体细节。

总之，文物摄影既需要拍摄者对文物本身有深入的了解，也需要结合美学、光学等知识灵活运用各种拍摄设备，掌握各种拍摄技巧，才能达到既满足文物艺术表现要求，又满足文物保护研究需求的目的。

(作者单位：吐鲁番市文物局)

日照市博物馆藏于右任手书石碑简析

程红

日照市博物馆新馆开馆两周年之际，特别推出新展馆藏石刻展，其中有两通于右任手书石碑，为首次公开亮相。墓碑的主人分别为“丁二公”和“丁五公”。这两位究竟何许人也？竟得书法名家于右任先生题写碑文！接下来笔者就带您一探究竟。

石碑内容

两通石碑皆为青石材，碑文字体俊美，行笔流畅，笔意结构取法魏碑，又兼具篆、隶之法，风格独特，自成一家，从中可略窥于右任书法大家的书法功底。

丁二公、安濡人、秦孺人合葬墓碑
高130、宽67、厚20厘米，碑文自右至左共9列154字。碑文如下：

公讳以所字敬斋增贡生候选训导
生于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亥时
卒于民国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卯时
安濡人卒于同治四年正月初二日辰时
秦孺人卒于民国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丑时
修职佐郎 考 丁二公
清例 显 合葬之墓
封孺人 妣 安濡人
秦

男 惟洵 惟沂 惟沧 孙 履赐 履素 履任
履恭 履昇 履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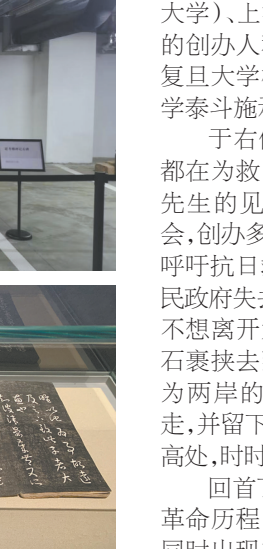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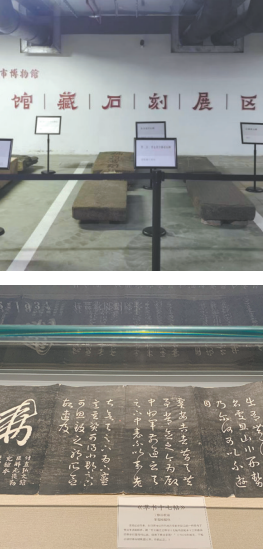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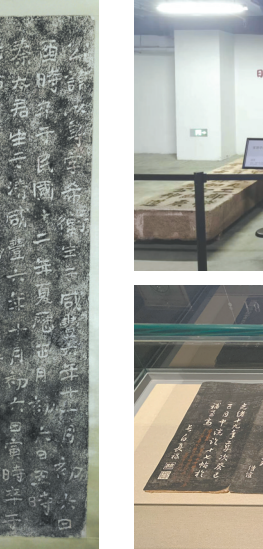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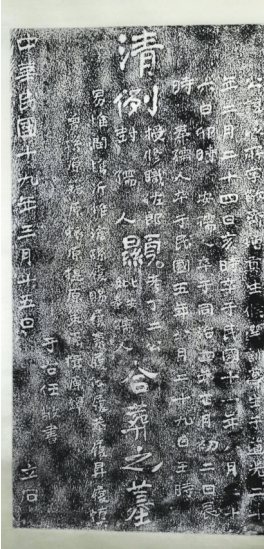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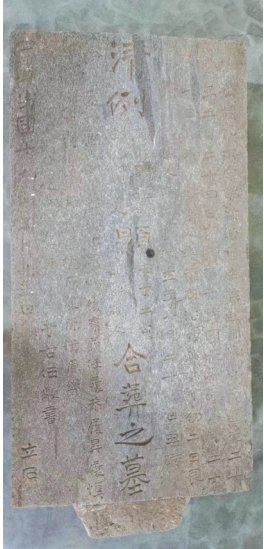
曾孙 原籍 原振 原提 原策 原捍 原铎
于右任敬书
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立石

丁五公、秦太君合葬墓碑
高125、宽66、厚17厘米，碑文自右至左共9列121字。碑文如下：

公讳以专字希衡
生于咸丰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酉时
卒于民国十二年夏历正月初六日丑时
秦太君生于清咸丰六年十月初六日寅时
卒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日酉时
考 丁五公
显 合葬之墓
妣 秦太君
男 惟滋 惟淑 惟沈 孙 履训 履履 履注
曾孙 原倬 原信
于右任敬书
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立石

丁二公、丁五公何许人也？

经查阅《日照丁氏家乘》：丁二公，名丁以所(字敬斋)；丁五公，名丁以专(字希衡)，二人乃同盟会创始人，被称为孙中山先生左膀右臂的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二伯和五叔，为日照市东港区涛



镇丁家庄庄人。

从墓碑记载的信息来看，丁五公就是一介平民，似乎没有任何政治和学术上的成就。丁二公以所“增贡生候选训导”“例授修职佐郎”，二位夫人皆“例封孺人”。根据白寿彝主编《中国通史》中《(清代)学校与科举》所述：“凡儒学中的廪、增、附生，按政府规定报捐为贡生的，称例贡。这是当时由捐纳入官的必由之路。……例贡或在监肄业，或在籍，均可称为国子监监生。”根据清代科举制可知：增生，俗称秀才，是清代科举的一种出身，是指在廪生正式名额之外增加的增生名额，增额者为增生生员，也称增生，为官学第二等生员(廪生为一等，附生为三等)。“增贡”是“例贡”的一种，是由增生通过报捐方式取得贡生资格的一种途径。“例贡”按其报捐前的增生(廪、增、附生)身份，可分为廪贡、增贡和附贡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，丁二公本为增生，是通过捐纳才取得了贡生资格，从而成为增贡生。做了贡生以后理论上就可以当官了，但是丁二公墓碑上只记载了“候选训导”。“候选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表示需要等待有相应的职位出现，才能上岗。“训导”即“儒学训导”，学官名，为府、州、县的地方官学中辅助教授、学正、学谕教诲生员的教师，官秩为从八品。可见，丁二公只是“候选训导”，并没有真正坐上训导的位置。丁二公最终“例授修职佐郎”。例授，即循例授官。参阅《清会典·吏部·验封清吏司》可知：清制封典，朝廷按照定例授予官爵。授予本人者为“例授”；因推恩而授给其妻之存者为“例封”，其歿(去世)者为“例赠”。由此可见，丁二公及其两位夫人在世的时候就受到了朝廷的封授。那么“修职佐郎”又是什么职位呢？经考，它是从八品的文职官员的官阶称号，为官衔虚职，并无实权。而

他的两位夫人，也因为其从八品官秩身份而得封“孺人”。从以上种种可以得出结论，丁二公非正途出身，但是通过他所取得官秩的途径我们又可以知晓，当时丁氏家族的经济实力应该是不可小觑的。

其侄丁惟汾与于右任

说到丁惟汾，不得不提一下日照丁氏。日照丁氏家族为当年日照县五大家族之首，山东著名科宦世家之一。丁氏家族人才辈出，自明代天启四年(1624)开科入仕，至清代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废除科举制为止，历明清两朝281年时间，共考取进士15人、举人49人、贡生85人、监生339人、庠生272人、廪生19人、增生44人、武生45人，其科第成绩为日照县之首。清末民初以降，又陆续出了“一门三进士”——近代军火工业先驱丁守存父子、山东省图书馆馆长——丁麟年、同盟会创始人——丁惟汾、北洋大学(现天津大学)监督(校长)——丁惟鲁、山东高等学校(现山东大学)校长——丁惟穆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——丁肇中等，更使日照丁氏家族享誉全球。

丁惟汾父亲——丁以排排行老三，秀才出身，系清代道光、咸丰年间朴学家许瀚的弟子，一生以教私塾维持生计，对音韵学和文字学颇有研究，著有《毛诗正韵》一书，深得民初汉学家章太炎、刘师培、黄侃等大家的赞赏。

丁惟汾父辈，除了其父丁以排，其他叔伯均不见经传，为何其二伯和五叔两通墓碑又得大名鼎鼎的于右任先生手书呢？这还得从丁惟汾和于右任的渊源关系说起。

丁惟汾(1874—1954)，日照市东港区涛

人，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，中国国民党元老。他始终追随孙中山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核心领导作用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丁惟汾积极协助、竭诚支持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，开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，孙中山曾有“唯丁是赖”的评语，称廖仲恺和丁惟汾为其左膀右臂。丁惟汾自幼秉承家训，深研古韵，对国学颇有研究，出版《语雅堂丛集》《毛诗解故》《尔雅释名》等多部。其女丁玉隽曾供职清华大学，是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先生的儿媳，外孙女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杨乐，侄曾孙丁肇中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。

于右任(1879—1964)，陕西三原人，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。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，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先驱，常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。于右任善书法，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，被誉为“近代书圣”“当代草圣”，其最大书法成就是“引碑入草”，即把碑学书体的笔意和审美融入草书，创作出一种全新的书法美学形态，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。他在大陆曾留下许多题字，奉化溪口城楼、四川青城山、西安碑林等地都有他的题字。他的书法作品极多，数以万计。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草民百姓，只要向他索字，他总是有求必应。到台湾后，为他人的题字内容多为劝人向善和思念故乡题材。于右任喜作诗，著有《右任诗存》《右任文存》等，晚年诗作眷念大陆之情颇深。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柳亚子曾经说过，国民党的诗人数于右任最高明，但是写的太少了，是名家，而不是大家。于右任还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，是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(今西北农林科技

大学)、上海大学、复旦大学的创办人和私立南通大学、复旦大学校董，并曾师从武学泰斗施肇基。

于右任终生爱国，一生都在为救国奔走，在孙中山先生的见证下加入了同盟会，创办多种报刊宣传革命，呼吁抗日救亡。1949年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的于右任本不想离开大陆，无奈被蒋介石裹挟去到台湾，仍然坚持为两岸的和平与统一而奔走，并留下遗嘱：死后葬于最高处，时望大陆。

回首丁惟汾和于右任的革命历程，经常会看到二人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事件中。

1926年3月18日，北京“三一八”运动中，李大钊、李石曾、顾孟余、徐谦、丁惟汾、陈启修、黄昌谷、蒋梦麟、于右任、林森以及学生总会和总工会的代表13人组成主席团成员，分为两队去执政府和外交团请愿，要求执政府严正驳复八国通牒，驱逐八国公使，废除不平等条约。1928年2月7日，在第二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，丁惟汾和于右任一起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。1945年9月6日，于右任设宴招待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的代表，丁惟汾等人受邀出席作陪。

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总结出丁惟汾和于右任的关系：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，坚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盟友，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，同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者。如此，于右任为了丁惟汾二伯和五叔题写碑文就不足为奇了。换言之，通过两幅碑文的题写，我们也能推测出丁惟汾和于右任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。

丁惟汾自二十几岁就离家乡日照外出求学，为了革命一生转战大江南北，就连他的副室郑全芳(丁玉隽之母)去世，时值北伐他正留守广州，都未回鲁奔丧。自1949年被国民党裹挟赴赴台湾，直到1954年逝世，丁惟汾再未回到大陆。现在日照本地很少能见到与丁惟汾有关的一手文献资料，目前日照公藏展览中仅在日照市博物馆“日照历史名人陈列”展厅中能见到他的手迹附记。所以说，这两通石碑的出现，不仅是两件难得的书法艺术品，同时也是两位老同盟会会员、著名民主革命家珍品的见证，对于研究两位重要历史人物丁惟汾、于右任以及其学术、书法艺术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。

(作者单位：日照市博物馆)